

歷史、俠義、諷刺、狹邪、譴責等類，夏氏所討論的「武軍傳奇」，似含有歷史、神怪、俠義、愛情等成份。他綜合分析有關的明清小說，證明武俠小說是由「武軍傳奇」演進而成。這種分析，已超越前人研究的範疇了。

(七)

本書編者在序言中表示，目前還沒有一本令人滿意的中國文學史書，因為現在仍有許多未能解決的問題，多方面的題材還沒有人澈底研究。寫文學史，必要研究文學體裁 (literary genre) 的定義、發展、演變、影響等問題，現有的文學史書，多是歷代幾位著名文學家的生平敘述，幾種代表作的扼要說明而已。縱觀數十年來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書，¹¹似乎找不到一本較理想的佳作，貝亞士教授的客觀批評，確值得我們檢討的。

何沛雄

11 參攷梁容若、黃得時合編《重訂中國文學史書目》，載《幼獅學誌》六卷一期（1967年五月）。

The Han Rhapsody: A Study of the fu of Yang Hsiung (53 B.C.-A.D.18).

By David R. Knechtges. Cambridge, London, New York and Melbourn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76.

本書為第一本研究楊雄賦之專著，全書共分六章：（一）緒論，（二）楊雄以前之賦，（三）《甘泉賦》與《河東賦》，（四）《校獵賦》與《長楊賦》，（五）楊雄賦論及其對賦體之改革，（六）餘論。此外，附錄有（一）《甘泉》、《河東》、《校獵》、《長楊》四賦寫作年代考，（二）現存楊雄賦真偽質疑，及（三）楊雄生平大事紀要年表。

西京賦家，馬（司馬相如）楊（楊雄）允稱巨擘。長卿之賦，博雅弘麗，武帝讀其《子虛賦》而善之，謂恨不得與其同時，授之為郎。（見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）；子雲作賦，每以之為模式，因其擬似，逐見賞於成帝，召待承明之庭。（見《漢書·楊雄傳》）由此可知，二人之賦製，關係殊深，然世之論者，言相如賦者多，言子雲賦者少；若較而論之，抑又未嘗有焉！劉勰以為：楊雄沈寂，志隱而味深，《甘泉》深瑋而絢明，固賦家之英傑也¹ 惟近世文史學家，或評之為「創作能力不強」，或譏之為「了無獨立思想」。² 可謂褒貶不一，抑揚隨意。今美國華盛頓大學康達維（David R.

1 見《文心雕龍·體性篇》、《才畧篇》、《詮賦篇》。

2 詹安泰等編《中國文學史》（先秦·兩漢部分）（一九五七年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）云：「楊雄喜歡模倣，因而他的創作能力不強。」（頁二一九）楊蔭琛云：「楊雄好作賦，常是模倣司馬相如的。……他的賦均非表現他個性，只是文字堆垛得很富麗而已。」（《中國文學史綱》一九五八年〔第十三版〕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，頁五十）劉大杰說：「楊雄一生著作，皆出於模擬。」（《中國文學發達史》上卷，一九六〇年台灣中華書局出版，頁一一六。）鄭振鐸說：「他以模擬為他的專業，既沒有獨立思想，更沒有濃摯的情緒。他所有的，僅只是漢代詞人所共具有的遺麗辭、用奇句的工夫而已。」（《插圖本中國文學史》一九六一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，頁九六。）

Knechtges) 教授，集古今中外材料，以客觀之態度分析之，討論之，讀者可得持平之論焉。

作者於緒論中，詳述楊雄之生平³及淺釋《法言》、《太玄經》之要點。又指出「楊雄嘗仕於新莽，後之學者，多詆其行，時至今日，斥之為叛徒 (traitor) 者，往往有之。」(p.2) 按《漢書·楊雄傳》云：「雄為人清靜亡為，少嗜欲，不汲汲於富貴，不戚戚於貧賤，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，……自有大度，非聖哲之書不好也；非其意，雖富貴不事也。」又云：「哀帝時丁、傅、董賢用事，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。時雄方草《太玄》，有以自守，泊如也。」可知子雲非趨炎附勢之徒，其仕新莽，乃情非得已。後人因此而毀楊雄者，絕無僅有。⁴ 作者所云，未免言過其實矣！

本書之第二章，首述賦之定義，次從《楚騷》及荀卿賦⁵ 簡述賦之起源，繼而畧論縱橫家之辯辭與漢初辭賦之關係，隨之介紹司馬相如及其同時之賦家，最後討論漢代「賞玩之賦」(The fu used for entertainment)。其中以分析枚乘《七發》之結構、文辭(pp.30—33)，最為可取，⁶ 而論司馬相如《子虛·上林賦》(pp.34—40)，亦能道出其修辭上之特點，惜敘述漢賦之發展時，作者未提及枚乘與司馬相如之關係。按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云：「相如以賞為郎，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，非其好也。會景帝不好辭賦。是時梁孝王來朝，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，淮陰枚乘、吳莊忌夫子之徒，相如見而說之，因病免，客游梁。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，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，乃著《子虛之賦》。」其時梁孝王之文士，善辭賦者，以枚乘為最高。《漢書·枚乘傳》云：「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，乘久為大國上賓，與英俊並游，得其所好，不樂郡吏，以病去官，復游梁。梁客皆善屬辭賦，乘尤高。梁孝王薨，乘歸淮陰。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，及即位，迺以安車蒲輪徵乘。」武帝亦賞識枚乘，違論「見而悅之」之司馬相如！相如游梁，與諸生游士同居數歲，其作辭賦，不免受枚乘影響，即以《七發》與《子虛·上林賦》觀之，兩者皆有諷諫之義。在結構方面，則有三點相同：(一) 假設人物，藉問答以成篇，(二) 開端設引言，以啓發賦文，(三) 排比列舉鋪陳，善用架構。在修辭方面，則更有五點相同：(一) 多用繼詞、別詞(如「於是」、「若乃」、「且夫」等)，(二) 刻意誇飾，(三) 臚舉鳥獸異名，(四) 堆砌描寫狀辭 (descriptive

3 作者根據《漢書·楊雄傳》及參考董作賓《方言家楊雄年譜》(載《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》八期[一九二八年六月]頁八二至八八。)湯炳正《楊子雲年譜》(載《論學》一九三七年四月刊[頁七六至九一]、五月刊[頁二五至四四]及六月刊[頁五九至八三])翻譯而成。

4 楊雄仕新莽，並嘗作《劇秦美新》一文，頗受後人訾議，尤以宋代理學家為然。請參看 Alfred Forke, (*Geschichte der mittelalterlich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*) (Hamburg, 1934), 頁七八至八三。

5 作者有《荀卿賦》“The Fu Chapter of Hsuntzu”一文，收入周策縱教授所編之《文林》Wen-lin 第二冊，即將出版。

6 作者有《枚乘七發》“Seven Stimuli for The Prince: The Ch'i-fa of Mei Sheng”(與史旺信 Jerry Swanson 合著)一文，載於 *Monumenta Serica* 29 (1970—1) 頁九九至一一九。

epithet)，(五)雜用長短句。⁷可知漢賦發展之初期，枚乘設軌於前，相如繼述於後，馳騁文路，遂為一代文宗。二人之密切關係，每為文史學家所忽視，故畧為補說於此。

全書之主要部份，厥為《甘泉賦》、《河東賦》、《校獵賦》、《長楊賦》之析論與英譯(第三章及第四章)，對每篇之寫作背景、主題、結構及語文運用(use of language)，均有詳細討論，可值一讀。作者特別指出：楊雄作賦，雖曰慕效司馬相如之所為，然比較二人賦篇，其相同之處實少，即以近似之《校獵》、《上林》二賦觀之，差異亦多(pp.63&74—77)。其說良是。大抵子雲作賦，仿相如之風格(style)者多，擬其辭彙者少，蓋子雲才高識博，又精於小學，不必仰餘唾於他人也；觀其《蜀都賦》、《逐貧賦》、《太玄賦》之體裁風格，與相如賦不同，亦可佐證矣。

楊雄《校獵賦》，《文選》作《羽獵賦》。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注：「校獵者，以木相貫穿，總為闌校，遮止禽獸而獵取之。」《文選·五臣注》云：「羽，箭也，言使士卒負箭而獵。」觀此，「校獵」與「羽獵」稍有不同。按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稱「天子校獵」，《漢書·楊雄傳》稱其「聊因《校獵賦》以風」。據此，則名之曰《校獵賦》為是。但《漢書·楊雄傳》亦云：「雄年四十餘，自蜀來至游京師，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，召以為門下史，薦雄待詔，歲餘，奏《羽獵賦》。」而《文選》以後，如《藝文類聚》、《楊侍郎集》(載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)、《歷代賦集》、《全漢文》、《古文辭類纂》等書，均用《羽獵賦》一名，然則「校獵」即「羽獵」耶？吾不得而知也。本書作者，採用《校獵賦》(Barricade Hunt)一名而未有注釋，或未知上文所述焉。

楊雄「顧嘗好辭賦」(《漢書》本傳)，及後則悔之曰：「壯夫不為也。」(《法言·吾子篇》)此種由好賦而轉為惡賦之態度，前人論之甚少，而本書作者都有精到之分析。彼從孔子之文質觀念說起，擇取《太玄經》與《法言》之要點，闡釋楊雄之文質觀念，以為子雲欲本詩人之意而作賦，藉以諫諍君王，然上賦數篇，其義不行，於是輟而不復為。其說良然。觀楊雄後期所作之《解難》、《解嘲》(可視作賦體)，既無諷諫之旨，亦無靡麗之辭，僅屬舒懷寄意之作，確知子雲作賦態度之轉變也。

餘論一章，作者認為近代文史學家對辭賦之評價，頗有偏見——毀者多，譽者少，同時貶損楊雄為司馬相如之附從模擬者(slavish imitator)，尤非持平之論。此不失為客觀之見。

本書翻譯楊雄之賦，計有《甘泉》(pp.45—51)、《河東》(pp.58—61)、《校獵》(pp.63—73)、《長楊》(pp.80—85)、《解嘲》(pp.97—103)、《逐貧》(pp.104—107)諸篇，均能不失原意。子雲之賦，一般讀者，多感艱澀，而本書作者，竟能旁徵博引，闡釋清楚，允稱難得之作。據悉，康達維教授研究楊雄作品，始於一九六三年，本書原為作者在華盛頓大學之博士論文，幾經修訂、補充，然後於一九七六年

⁷ 詳見拙著《司馬相如子虛、上林賦與枚乘七發的關係》，載《人生雜誌》第三十二卷第十二期，頁二四至二八。

刊印成書，屈指前後達十三載云。其用力之勤，概可想見矣。

書未附有《蜀都賦》之真偽問題討論，惜僅哀集他人之言而無新意。按：楊雄，蜀郡成都人也，嘗作《蜀王本紀》（見《全漢文》）及《成都四隅銘》⁸，對蜀都掌故知之甚詳。《漢書·楊雄傳》云：「先是時，蜀有司馬相如，作賦甚弘麗溫雅，雄心壯之，每作賦，常擬之以為式。」可知其作《蜀都賦》，固非鑿空而言也，歷來論此賦者，皆未及此，故特為之補說焉。

何沛雄

⁸ 《成都四隅銘》原文已佚。楊雄《答劉歆書》云：「雄始能草文，先作《縣邸銘》、《玉卮頌》、《階闈銘》及《成都四隅銘》。蜀人有楊莊者，為郎，誦之于成帝，成帝好之，以為似相如，雄遂以得見。」（《全漢文》卷五十二）可知其嘗作此銘文也。

China's Imperial Past,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.

By Charles O. Hucker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75. 450 pp.

通史，顧名思義，為通貫古今之史。由於中國歷史之悠久，資料之豐富，史家撰述之時，每因觀點與取舍之偏差，未盡通貫之旨。是以在林林總總的中國通史著作中，真能貫串今古，兼及全面的，可謂鳳毛麟角。

Charles Hucker 教授，積近二十五年之教學與著作經驗，從事中國通史的研究，撰成《中國皇朝往史：中國歷史與文化導論》（*China's Imperial Past: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*）一書，上自遠古，下迄太平天國之歷史，概括其中。

全書主要分五部份：第一是引論，第二、三、四是正文，第五是後記。引論精簡扼要地介紹構成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主流和伏線。作者分兩方面加以論述：（一）「土地與人民」（Land and People），包括地理背景、人種、與語言文字等三節。在第一節中，作者通過南北地勢與氣候之不同，解釋中國地區性之獨立與人民性之分歧，尤為精闢。（二）「中國生活中若干基本之持續性」（Some Basic Continuities of Chinese Life），着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、邊防與外族之關係，國家一統與朝代週期等問題，內容概括得要，有條而不紊。

正文分三部份，無疑反映了作者對中國歷史分期的看法。作者認為由遠古至公元前二〇六年秦亡，是中國歷史的形成期（The Formative Age）；自漢帝國建立至五代（公元前二〇六年至九六〇年），為早期帝國時期（The Early Empire）；自宋立國下至太平天國肇事（九六〇年至一八五〇年），屬後期帝國時期（The Later Empire）。

在形成期中，作者認為政治、社會、經濟三方面彼此關聯，互為影響。由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前三世紀，中國人不斷地在建設、實驗和重建新制度的體系，以穩固及持續